

刘宣庆

广东澄海人黄际遇,在民国学界是红得发紫的牛人。他是多个大学的数学系主任,又是天文学家、文学家、音韵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。

1925年11月,黄际遇由上海乘舟南下,返回汕头,船到了福建诏安古雷山,不幸触礁沉没,又遇到海盗。同船之人多罹难,黄际遇幸而脱险。但是,他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散失,二十年的著作(日记、笔记等),都付海浪飘零。抗战胜利后,中山大学复员返穗,他与同事乘木船从北江南下,道经清远峡时,不幸坠水身亡。诚如英国诗人济慈所说,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水上。黄际遇一生的遭际和命运,正是如此。

1885年,黄际遇生于澄海一个名门望族。14岁中秀才,1903年到日本,入宏文学校普通科学习,1906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攻读数学,1910年毕业。他选择数学,成就了大学数学系教授的老地位,奠定了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基石。在日本留学时,黄际遇与范源谦、经亨颐、陈衡恪、黄侃过从甚密。“春秋暇日,更与季刚从余杖屐太炎游,遍窥各家门径。”黄际遇对音韵文字之学的研究,大概始于此时。

1910年,黄际遇回国,受聘天津工学堂任教,下半年参加京试,中格致科举人。1914年,黄际遇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,开始了在大学教书的40年生涯。

1920年,黄际遇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,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数学,1922年获硕士学位。梁实秋的回忆文章写道,黄际遇在澄海的老宅,其匾额题“硕士第”。1924年,黄际遇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;1926年应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;1928年又北上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,还一度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。黄际遇担任河南教育厅厅长时,与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打交道,“为维护河南大学计,雅非其志而抗颜”。有一次,河南大学爆发学潮,大学生罢课,韩复榘大怒,传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回话。黄际遇感到不妙,陪同张去见韩。一见面,韩复榘厉声叱责,张广舆刚要申辩,韩喝令跪下。张校长脖子一梗,抗声说:“士可杀,不可辱!”韩复榘顿时下不了台,冷笑一声说:“好,我就杀了你!”黄际遇一看事情不妙,害怕真的入命。于是连拉带推,使张校长屈膝离开现场。后来有了黄际遇初智救张广舆之掌故。后来,黄际遇在青岛执教山东大学,韩复榘来校视察,黄际遇想起当年的这段不快,仍然有一些惴惴不

安,把这段往事讲给梁实秋听。

1930年,杨振声在青岛筹备大学,是年夏天,国立青岛大学(1932年更名为山东大学)行开学典礼。杨振声为校长,黄际遇为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,两位学者,一个是蜚声国内的文学家,一个是闻名遐迩的数学家。在这次开学典礼上,两人一出场,就是全场焦点。不妨通过梁实秋的描述,看看黄际遇的肖像:紫膛脸,膀大腰圆,穿的是长衫,黑皂鞋;讲一口广东官话,调门很高,性格爽朗而诙谐;他的长衫有一个特色,左胸前缝有一个细长细长的口袋,内插一根钢笔,取用方便。有亲炙黄际遇先生风采的门生弟子,回忆说,他爱穿一件玄色长袍,胸前缝有两个特大的口袋,左边放眼镜,右边放粉笔。

黄际遇爱才惜才,提携后进,善于捕捉并培养新生苗子。1932年,刚大学毕业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任教的刘书琴,好学上进。黄际遇特地安排刘到山东大学数学系作一次讲演,讲题是“数学的定义”。

1933年11月,山东大学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举行学术报告会,又让新到任的讲师杨善基讲“几何学的分类”。对于这类大胆启用新人的特别讲演,黄际遇事先准备好内容提纲,向讲演人提出具体要求,进行细致指导,目的是给青年才俊一个锻炼的机会。以后,刘书琴留学日本,杨善基留学美国哈佛大学,学成回国后,刘、杨一直在高校数学系任教授。

黄际遇博学,出口成章。当蔡元培先生来青岛度假,黄际遇一见面,脱口而出:“君住故都皇帝之居。”蔡元培则对曰:“子住岛上神仙之宅。”两人相视大笑,在场教授鼓掌叫好。

杨振声掌青岛大学时期,有几位教授豪于酒,常常聚饮。他们中间还出现了八位善饮者,人送雅号“酒中八仙”。黄际遇为其中之一。“每当宴会,酒阑兴发,击箸而歌,声振屋瓦,激昂慷慨,有古燕赵豪士风。”黄际遇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执教时的学生张云,后来成为中山大学的校长,如此评价乃师。

在青岛的这一段时光,是黄际遇人生中风平浪静的好日子。

张勤于写日记,在山东大学执教五年,他写的日记名为《万年山中日记》《不其山馆日记》。万年山,今青岛山,位于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东北。1891年青岛建置,在八关山麓建造的广武中营和崇武中营,位置分别是鱼山之北(今海天南部鱼山路操场一带)和八关山西北部(今海天北部五校门一带)。德国侵占青岛后,在

一生写进日记的鸿儒黄际遇



黄际遇在青岛

此建俾斯麦兵营。1914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,将德国的俾斯麦兵营作为万年兵营,遂兵营附近之山,被称为“万年山”。黄际遇在其日记第二十册小序有说明:“万年山者,国立山东大学旧址之西南,当年日德人聚兵于此,筑营其间。三面环山,一面当海,东临海,西隐,隐然具备。今则修文偃武,弦歌礼乐,三年于兹。”梁实秋也有一段描写:“青岛大学是新创立的学校,校址万年山麓,从前德国的万年兵营,有五座楼房,房屋构造坚固,勉强可以用作教室宿舍。”梁实秋的回忆文章还提到黄际遇的住所:“1930年一多送春回乡,返校后就住在学校宿舍,好像是第八校舍,是孤零零的一座楼,在学校的东北方……楼上有一个套房,内外两间,由一多住;楼下的套房由黄际遇(任初)住。这位黄先生比我们年长十几岁,是数学家,潮州人,喜欢写字,下象棋,研究小学,为人很豪爽。”《不其山馆日记》的得名,则源自青岛城阳一带,在汉代称为“不其”。不其县,西汉置,因山为名。不其山,今铁骑山。考古学家王献唐著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中说,原始社会末期,在不其山周围生活着“不其”和“其族”,山以二族得名。黄际遇在青岛写的日记,《万年山中日记》24册、《不其山馆日记》3册,今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“文化名人档案库”永远收存。在青岛,梁实秋对黄际遇的

日记印象深刻:“他的日记摊在桌上,不避人窥视,我偶然亦曾披览一二页,深佩其细腻而有恒。他喜治小学,对于字的形体构造特别留意,故书写之间常用古体。”《万年山中日记》主要用中文,也偶尔夹有英、日、德文;文有散有骈,此外还有对联、书信、棋谱和大段大段的高等数学方程算式。杨方笙教授在《黄际遇和他的〈万年山中日记〉》文中写道:“由于它全部用的是文言文,有些还是华丽富赡,用典很多的骈体文,文章里用了许多古今字或通假字,而且绝大部分没有断句,不加标点。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,几乎触目皆是荆棘,无从下手。”“蔡元培先生曾说:‘任初教授日记,如付梨枣,须请多种专门者为之校对。’”

李新魁教授在《博学鸿儒的黄际遇先生》文中写道:“先生勤写日记,日以蝇头小楷记述其研讨学问之心得,诸凡数理文学、文字语言、棋艺评论,各项见解,杂然并陈。时或记述交游,学者文士往来之行踪,写景、抒情以及酬唱之辞,时厚笔端。日积月累,竟达四十七厚册。”学人的日记,是第一手的文史资料,其重要性自不待言,“录心境之起伏,著世事之兴替,为文为史,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”。

黄际遇的《万年山中日记》和《不其山馆日记》,是他执教山大时写下的,不仅记录大学里的科研、教学活动,同时,也为上世纪30年代青岛的文化学术活动留下了翔

实的记录。比如,他在1933年11月24日记录的山大的学术活动:

徐光启先生三百年纪念祭下午三时在科学馆举行。主会者大学数理会,到会者数学物理两系全体师生,到会者蒋右沅(李斯代表)、教育局王科长、赵大伟、杜毅伯、赵泽之、罗玉君。首由予报告徐光启传略,几何原本概要,几何学发达史概观。次由李斯报告徐光启在天文学上之贡献,翔实充畅。杨善基报告几何学之分类,条理明晰(别见记录)。

今日大公报特发图书增刊,载二文曰: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及徐文定公与补学,文穆而脆,盖盖徒之言,不过尔尔。又有关于徐光启新刊三种增订:徐文定公集(七角)、徐氏庖言(一元五角)、徐上海特刊(二角,均由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出版)。今日可云科学之极盛已。

会终逢之同来八校舍晚酌,偕善基访大伟,戴月而行,山光波影,远近掩映。

从这天的日记来看,黄际遇虽然是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但他的审美、旨趣,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。请看1934年4月28日:“入夜空如箫寺,心冷于僧,止水在掣,薰香味永。”1934年5月27日:“出访晓航,对席窗前,万里海天,尽入怀抱,一年最好莫过此时。玉君夫人为拍二照,积弊之躬,渐于对镜久矣。旋返空斋,茗香自遣。”在青岛的六年,的确是黄际遇生活比较安定的时光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日寇步步紧逼,九一八事变后,东三省沦陷,随后,华北危急。内忧外患之中,中山大学的学潮频发,“酒中八仙”先后离开青岛。而黄际遇告别青岛,是在1936年2月13日。请看他当天的日记:

晨起清行囊,分广州者六件,归汕者二十余件,老鼠搬搬更相关也。晤智斋,即来宏成发补日记。为勿秋书手卷,写《直归行》全首六百余言,以行草行之。心思二王(孟津、阳明)之意,欲出矣简劲清适而未成也。智斋来共饮几爵,亦索一轴以爪印之迹。晚躬玉君夫归来(各资馈行粮)。嘴成来以胡念修纂文叙录汇编一小册为订订之券。宏成发馈花生油蔬菜各若干。它友均未及知予行,刘康甫赶上,一副诸友言欢拳拳,日加申旁人催行,乃接浙而行,同车至海隅,少顷鸣钲解缆矣。送行者自崖而返。

自此黄际遇离开青岛,重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。从上述这一天起所写日记称《因树山馆日记》。这一天,也是黄际遇一生的一个转折点,他把自己的学术生命镶嵌到中山大学。在中山大学,任数学天文系主任,兼任中文系教授,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“历代骈文”。

他经常幽默地说:“系主任可以不当,骈文却不可不教。”听过黄际遇讲骈体文的学生何其逊写道:黄际遇先生摇头晃脑地吟咏汪中的《吊黄祖文》,“而且还伴随着那抑扬顿挫、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,以手击几,以脚打板,连两眼也眯缝起来,脑袋也在不断地画着圆圈。”何其逊的同桌李德善说:“黄老师来教骈文,就是为了过瘾。”而他的板书,也非常有特点,一律用篆书写黑板,写得又好又快。

1938年10月,日寇侵犯广州,形势危急,中大迁校到云南澄江,又迁回粤北坪石。1944年秋,李约瑟访问中山大学,盛成和黄际遇欢迎李约瑟来访。在播迁流离之中,“黄际遇弦歌不辍,犹有古学者之流风遗韵也”。不论环境如何简陋、艰苦,黄际遇闲暇之时,都可安心读书写字,研究象棋。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,又随中大理学院迁至连县。

1945年8月15日,抗日战争胜利,举国欢腾。分散各地办学的中山大学师生,陆续返回广州校址。10月17日,黄际遇一行80余人,赁大木船一艘从粤北的北江乘船返校。10月21日,“上午8时许,船行至白庙,将抵清远城。先生因出船舷解手,失足坠于江中”。同船的中山大学教务处长邓植仪警觉,“悬炬心急营救,四子家枢随侍,亦仓皇下水救,卒以谿僻不救已溺,增援力薄,遂罹难。”一代岭南才子,风流付水,终年61岁。

黄际遇遇难的噩耗传来,和黄际遇在青岛山东大学交往甚密的,华北危急。内忧外患之中,中山大学的学潮频发,“酒中八仙”先后离开青岛。而黄际遇告别青岛,是在1936年2月13日。请看他当天的日记:

晨起清行囊,分广州者六件,归汕者二十余件,老鼠搬搬更相关也。晤智斋,即来宏成发补日记。为勿秋书手卷,写《直归行》全首六百余言,以行草行之。心思二王(孟津、阳明)之意,欲出矣简劲清适而未成也。智斋来共饮几爵,亦索一轴以爪印之迹。晚躬玉君夫归来(各资馈行粮)。嘴成来以胡念修纂文叙录汇编一小册为订订之券。宏成发馈花生油蔬菜各若干。它友均未及知予行,刘康甫赶上,一副诸友言欢拳拳,日加申旁人催行,乃接浙而行,同车至海隅,少顷鸣钲解缆矣。送行者自崖而返。

斯人已逝。70年后,翻阅纪念黄际遇的文章,不由得让人慨叹,这样的学者,世间罕见。他将治学娱乐都“玩”到了极致。青年时代喜击剑和足球,在日本留学时,曾获击剑比赛荣誉奖;在青岛大学执教时,曾为学生的足球比赛当执法裁判。中年喜欢下象棋,与人对弈不用棋盘,在中山大学执教时,常与省港象棋高手过招。晚年研究棋谱,将棋艺与数学之原理汇通,推演棋谱,手订《畴盒坐稳》五十册,匠心独运。

回想黄际遇的一生,从晚清到民国,处在社会风云变幻多端、新旧交错、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。如果没有1945年深秋的不幸失足落水溺亡,他一定能迎来一个新的时代。

吴伯箫致徐开奎的两封信

马国平

1980年7月20日,《文汇报·笔会》副刊开辟了“我和上海”栏目,“请全国各地的作者、读者来共同耕耘”。这个栏目延续了较长时间,吴伯箫、臧克家、碧野、杨沫等全国著名作家相继发表了他们的散文作品。吴伯箫先生的散文《第二次到上海》是该栏目的第一篇作品,叙述了他作为一个旅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旅行的经历。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吴伯箫散文选集中,成为他众多散文中独居地域特色的佳作。

笔者藏有吴伯箫1980年6月致徐开奎的两封信,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吴伯箫写作发表作品的经过。吴伯箫是应“笔会”主编的徐开奎的来信邀约后,写作完成《第二次到上海》的,他在寄送稿件的同时附信一封。在接到徐开奎用稿回信后,吴伯箫又马上回信。让我为之关注和感动的,是两封信中字里行间展现的吴伯箫的为

人性格和行事作风。

(1980年6月19日信)六月十二日信收到。

遵嘱赶写一篇《第二次到上海》,把积累了十多年的点意思写出来。感情是真的,看能否采用?

写稿子不容易,《文汇·增刊》文代会(指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—笔者注)的时候催稿子,那时拙著《烟集》正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,我寄了“再版”后记给××同志,没有回信。转请××同志回过一次,也没有下文。《烟集》再版出书已经半年了,《文汇·增刊》在北京却没有看到过,为什么《后记》处理情况不能用一纸明信片就告诉一下呢?书既然出版,向读者介绍一下是可以的。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,香港《文汇报》一位作者叫“少海”的就在“文化之窗”写了文章。本来《后记》也可给《战地》或《读书》的,因为“一稿不能两投”,没敢破例。写稿子实在困难啊!

《第二次到上海》没有留底稿,限于个人条件(没有复印机、

打字机、钢板,复写可以,又缺乏时间)没有复制、打印或复写。所以挂号寄出,并附邮票二角,备不用时挂号退还之用。

如果采用,就请寄清样两份(一份校后退回,一份留着作集稿时用;若发表后就寄一份单张,后一份也可免)。

太啰嗦,麻烦。但没有办法,我曾把沈阳农学院教授的一部《经济动物》原稿转给教育部一位局长,弄丢了,两年无下落。像欠了“血”债,至今不安!

(1980年6月28日信)真高兴收到六月廿四日来信。

《第二次到上海》是作为“我和上海”栏写的,没有多少文采,但是真情实感。

这次“笔会”处理稿子,快到令人感佩。五十年来写稿,记得只遇到四次:

《京报·副刊》,除夕交稿子去,新年就见了报。

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丁玲同志发我的稿子有一次没超过两天。

六一年《光明日报》发我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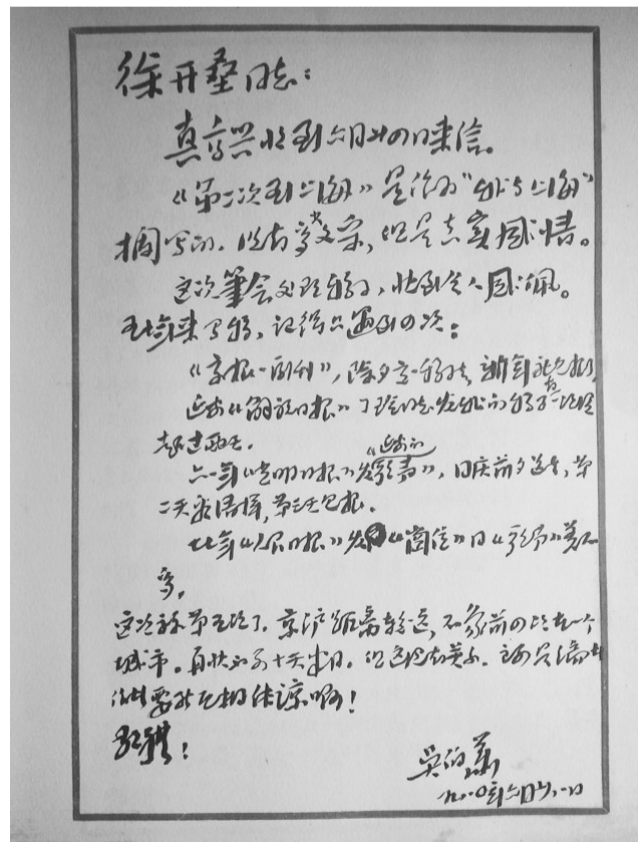
《延安的歌声》,国庆前送去,第二天看清样,第三天见报。

七七年《人民日报》发《岗位》,同《歌声》差不多。

这次算第五次了,京沪距离较远,不像前四次在一个城市里。再快也要十天半月,但这没有关系。主要是编者作者要能互相体谅啊!

吴伯箫从投稿到发表来看,其间也有一个月时间了。考虑到京沪两地邮路遥远,吴伯箫六月十九日寄稿,徐开奎仅相隔五天即回应并给予用稿的满意答复。如此回应可谓快速,徐开奎这样做或许是在为报社同行弥补过失。吴伯箫因此格外高兴,欣然回忆起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四次类似的经历。吴伯箫后来在他生前最后编定的两种散文选集中都选入了这篇《第二次到上海》,也许是出于这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《第二次到上海》发表两年多后,吴伯箫先生不幸因病逝世。1984年1月6日,吴伯箫子曾寄信给徐开奎,意欲征集吴伯箫信



吴伯箫书信影印件

件。信中文言及《吴伯箫文集》已经整理编定篇目准备出版,又拟着手征集吴伯箫的书信出版《吴伯箫书信集》。不过,上述《吴伯箫文集》出版不顺无果而终,延至1992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吴伯箫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得以出版。三十多年来陆续有关于吴伯

箫的年谱、研究资料及书影录问世,《吴伯箫书信集》似乎迄今尚无踪影。近年来吴伯箫书信多有流出,对编定出版《吴伯箫书信集》各有利弊。现在时机应该成熟,倘有吴伯箫研究者有志于此,尚希促成《吴伯箫书信集》早日汇集出版。